

BURMA CAMPAIGN

「英」弗兰克·麦克林恩 著

章启晔 译



缅甸战役

从灾难走向胜利 (1942-1945)



上海三联书店

缅甸战役

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

（英）弗兰克·麦克林恩 著
章启晔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英)麦克林恩著；

章启晔译. —2版.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8

ISBN 978-7-5426-5267-6

I. ①緬… II. ①麦… ②章… III. ①国民党军—抗日战争—史料—1942~1945 IV. ①K265.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7290 号

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

著 者 (英)弗兰克·麦克林恩

译 者 章启晔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何志向

装帧设计 孙豫苏

责任校对 诸 瑛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江苏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580 千字

印 张 37.5

书 号 ISBN 978-7-5426-5267-6/K·329

定 价 58.00 元

THE BURMA CAMPAIGN: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45

By FRANK MCLYNN

Copyright: ©2010 BY FRANK MCLYN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译 序

Since memory is actually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struggle (really, in fact, struggles develop in a kind of conscious moving forward of history), if one controls people's memory, one controls their dynamism.

译自 Michel Foucault,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因为记忆确实是斗争中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真的,事实上,斗争在某种推动历史前进的意识中发展),如果有人控制了人们的记忆,那他就控制了他们的活力。

——福柯,“电影和公众记忆”,1977年

—

这本书是至少值得您浏览一次,不是因为那场战争能够特别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①或者特别适合为国民党政府的正面战场去除“污

^① 虽然我们应该感谢章东磐、戈叔亚、余戈等人,尤其是作家兰晓龙、导演(转下页注)

名”，^②而是因为日本和朝鲜半岛决定不了中国是否成为 G2(中美共治)之一极，缅甸和印度却有可能决定中国至少是亚洲之王，还是世界血汗工厂、东亚病夫乃至分裂成若干个国家。^③

(接上页注)康洪雷和“我的团长我的团”(还有后来的《中国远征军》)全体演职人员，他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大陆的主流社会关注那场战争和健在的老兵，但余戈先生把日本陆军 3 次“玉碎”战(即全军覆没)完全归功于中国军人是大可商榷的，只看本书就不难知道反攻密支那时有美国陆军在中缅印战区直接参战的唯一成建制的部队和英国“钦迪特”特种部队参战(这两支部队在战后均因死伤惨重而被取消原编制)，还不算英美空军和美国筑路部队，松山战役时，制空权在美国人手上，而战斗之惨烈与蒋介石与美国讨价还价要援助有关，余戈先生自己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就记录了这一史实(第 55 页，三联书店，2009 年 8 月第 1 版)，否则无从解释经过美国人训练、拥有美式装备和实战经验的部队怎么在东北被歼灭，哪怕共产党军队得到了苏联的巨大帮助(参见杨奎松的“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载于《读史求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1 月第 1 版)。要讲激发爱国热情？台儿庄战役或许更适合：当时日军刚占领南京，中国人作战完全靠的是自己的部队，其中多半是杂牌部队，其中川军一洗战斗力薄弱和军纪涣散的恶名，更能让人们感到我们这个国家延绵的生命力。长沙会战(尤其是第三次)的胜利堪称辉煌，相比之下，无论是从印度还是从中国攻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都享有美国制空权、装备、后勤保障。

^② 就中国战场而言，抗日主力自然是国民党军队，“正名”犹如堂吉珂德大战风车。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国民党抗日战绩的宣传不力，并非不能理解，但中共对蒋介石政权的抨击主要在其内政上，只不过更注重褒扬自己的抗日战绩。台儿庄大捷还是首先在大陆拍成电影的(《血战台儿庄》，1986 年)，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因此说：“1987 年此片上映时，笔者正在上海，看过之后，不禁感慨万千：国民党军队抗战中打的一个大胜仗，竟被中共方面率先拍成电影，大肆宣扬，真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温故》十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相比史迪威，大陆对陈纳德更为推崇，与台湾并无二致。商务印书馆在 1984 年翻译出版了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国文史出版社在 1987 年出版了《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共 12 册)，中华书局在 1987 年与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合作出版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缅甸作战》，军事科学出版社在 1995 年出版了徐康明撰写的《中国远征军战史》，也不能说在戈叔亚等人之前国内缺乏对抗战的研究。

^③ G2(直译是两国集团)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C·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首先提出，此处译为“中美共治”，考虑到 G2 不止是经济意义的前景。中日再开战的可能性等于中美开战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最坏的情况是北方以战争谋生路，但它获胜的可能性极小，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正在中国周围构筑防线的情况。东亚应该构建“共荣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0 年 1 月第 1 版]一书就有一节名为“大中华及其共荣圈”，因此，此处“共荣圈”的含义近于“东亚共同体”)，但这 3 个国家历史恩怨极深，而美国不会坐视。在翻译此书期间，缅甸政府不仅继续推行它在二战前启动的统一之路，先攻打果敢(汉族)，近日在攻打克钦族(景颇族)，导致难民涌入中国，或在中国边境聚集，其士兵甚至敢冲入中国国境枪杀中国公民，而且假民主之名，(转下页注)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缅甸战役？那犹如问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历史和时事。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在全球殖民和工业化革命所积累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那么这次大战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以至于20年后那场“白人的战争”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④但二战是一次对历史的彻底清算吗？它只是欧洲矛盾的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对全世界来说，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样血腥。例如，据巴基斯坦国父真纳的传记作者说，印巴在分治前后的冲突致死人数超过英联邦在二战时的死亡数，^⑤如果有人有兴趣估计一下二战后各国因战

(接上页注)寄望靠欧美日，制衡中国和印度，中国在那里的水电投资和输油管线都可能打水漂(凸显了当初藉此破马六甲困局的思路的一厢情愿)。欧美日对缅甸境内少数民族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并无其在叙利亚表现出的“正义感”。印度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继承人，那意味着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西藏都是其领土，曾经败给中国只会加重它以中国为敌的情绪。而中国被巴基斯坦拖入战争的概率并不小于被迫应对朝鲜半岛战事的概率。如果中国获得印度洋的出海口，那么美军驻扎在新加坡的意义大为缩小，而对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有可能导致东南亚和南亚的加入(现在则是东亚和南亚“讨好”东盟)，由此形成真正多极的世界。

④ 对战胜国来说，那是一次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胜利：英国(无论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大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伤的军人远远多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例如在一战中英国死亡了886939名军人，在二战中则是383800名(均据维基百科网站)。更坏的是，在192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企图恢复金本位制的尝试失败后，世界领袖的责任只能期望孤立主义色彩浓重的美国承担。第一次有能力影响欧洲格局的美国受制于国内政治，威尔逊总统未能实现其理想，而本来可以大发战争财的美国在陷入波及当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后才感到自己既无法与欧洲的旧世界又无法与非白人世界切断关系，独善其身，最后自身遭到攻击并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成为世界领袖。日本入侵中国，企图以“大东亚共荣圈”构建抵御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自立的美国所实施的斯姆特-霍利法和大英帝国在其势力范围内采取的“帝国特惠制”，最终与昔日的盟国开战并惨败。对战败国来说，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确实土崩瓦解，但德国迅速恢复，能够在二战初期横扫欧洲大陆，逼得英国政府准备迁移到加拿大继续抵抗，甚至一度有战胜苏联的希望。此外，始终被视为欧洲野蛮国家的苏联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成为西方世界在20世纪的最大敌人，就像是昔日的伊斯兰势力，而真正的伊斯兰世界呢？“1920年其领土扩张达到顶峰之际，西方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近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领土减少了一半，大约还有1270万平方英里。……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的领土由1920年的180万平方英里扩大到1993年的1100万平方英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64页，英文版第84页)。

⑤ “在这次内战期间，大约五十万人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年中，(转下页注)

争而死亡的人数,只怕结论是第三世界一直在自相残杀,尤其是同胞杀同胞,致死人数恐怕远远超过两次大战中战死的白种人之和的数倍。当西欧“抛弃”民族国家的理念时,非欧美之外,民族运动方兴未艾,孰是孰非,那得看您生活在韩国还是索马里,或者说,处于食物链的哪一端。

我们关心历史首先是为了未来。

在60年前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已经从改朝换代却被只不过经历一次明治维新的日本打得国将不国,维系外国援助的主要是一条滇缅公路,蒋介石不得不派出其精锐部队进入缅甸。^⑥在这个时刻,仿佛上帝眷顾中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同情中国,成功逼迫日本与其开打注定失败的战争,从而公开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提供援助。^⑦美国还派出了美国陆军里的中国通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的后盾是美国军界翘楚马歇尔,甚至得到史汀生(陆军)、欧内斯特·金(海

(接上页注)整个英联邦差不多也就死亡这么多人。”伊恩·斯蒂芬斯:《巴基斯坦——古老的地方,新兴的国家》,1964年,企鹅出版社,第129—130页;转引自《真纳传》,[巴基斯坦]G·阿拉纳著,商务印书馆1983年6月第1版,第357页。

⑥ 例如,据陶涵的《蒋总司令》(*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Jay Taylor,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942年在东瓜(同古)作战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是唯一能够完全靠卡车运动的中国部队(第200页);同年杜聿明(第五军军长)为保住拥有野战炮的这支部队而惜战,让哈罗德·亚历山大觉得无法理解,与史迪威发生激烈冲突。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第五军曾在1939年打过昆仑关战役,取得局部惨胜(号称是“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光辉战例”)。在所谓的昆仑关大捷后,中国的海上通道被封杀。

⑦ 必须说明的是苏联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提供了宝贵的援助:“苏联在1937、1938和1939年共提供了2.5亿美元(3%年利率)的贷款,1000架飞机、约2000名飞行员和500名军事顾问;西方则为2.635亿美元。1942—1945年,美国贷款5亿美元,租借法援助13亿美元,不算1941年的2600万美元和1946年的2.1亿美元(占总额的3%)。”(徐中约,《中国的奋斗,1600—2000》,第六版,第481—482页)。至于罗斯福的“中国情结”,本书作者哀叹:“美国绝不会只是为了帮助大英帝国而进行干涉,甚至当英国本身在1940年看来有可能向希特勒投降时,它都没有那么做。只有当中国被加入方程式时,日本与美国开战看起来才具有某种必然性。”(第一章)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已经在有意(如限制出口废钢铁)无意(斯姆特-霍利法)压制日本,从而在主观和客观上帮助了中国。

军)、“哈普”·阿诺德(在陆军和空军[1945年]都是五星上将的唯一人物)的支持。那时的情景是不是看上去比现在更有可能实现“中美共治”?实际结果却是虽然蒋介石借助日本人废除了治外法权,作为盟国元首参加了开罗会议,甚至成功地赶走了史迪威,但却在4年后败给毛泽东,逃往台湾,了其残生。

被作者称为缅甸战役的这场战争涉及未来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3个(英国、中国、美国)和4个“候选”国中的2个(日本和印度)。2010年,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中、日排前三,英国占第七,印度为第十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居第四。但这场战争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战争:在英国它是由“被遗忘的军队”(见本书第五章)打的“被遗忘的战争”(Jon Latimer),尽管它打出了威廉·斯利姆这个英国最伟大的将军,^③至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英国将军(超过多数中国人更熟悉的蒙哥马利),也许是因为战后英国丢掉了印度和缅甸而被“遗忘”,就像本书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就对印度用兵,不结盟运动从此成为空谈,而印度从此把中国视为对手。二战后日本而不是中国逐渐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忠实盟友,恐怕更令国人窝心的是日本比中国更富裕,哪怕中国在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取代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今天。

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在这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中国犹如当年的日本。这才是我们需要关心60年前那场战争的首要因素。如果中国这个臃肿、迂腐、溃烂的“潜水艇三明治”^④能够有清醒的头

^③ <http://www.nam.ac.uk/exhibitions/online-exhibitions/britains-greatest-general/william-slim>。

^④ “潜水艇三明治”之语出自黄仁宇,指“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本书和作者”,《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详见《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2008年11月第1版,第368—378页)。这种说法或可参考:中国的底层是人数庞大的农民,“六百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中国大历史》第290页),既是中国得以延续的基础,也是中国实现西式现代化乃至摆脱“黄炎培”(转下页注)

脑，^⑩至少是良好的集体记忆，那么蒋介石不应该在那场战争结束之际匆忙撤军，而是应该尽可能在缅甸驻军^⑪；新中国成立后应该着手在四川设立类似于新疆建设兵团的组织，与其镇压地富反坏右不如将其移民藏南。^⑫当然，这一切只是“如果”，我们必须牢记纸上谈兵与实际操作完全不是一回事，否则就像现在还有一大批愚民奢谈外蒙独立的责任，仿佛那时他们是国家领导人就能在财政破产（国民党）或百废待兴（共产党）的情况下领导打不过日本的中国打败苏联。

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第一条恐怕是明白当时美国为什么要遏制日本，同情弱者等道德考虑肯定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美

（接上页注）周期率”（1945年）或“黄宗羲定律”（秦晖，2000年）的障碍，至今依然如此；中层可以说是城市，因为有庞大的土地和人口作为后盾，历次改朝换代后都能迅速富裕起来，它们的精英或多或少都有农村的亲友关系，因此同情贫穷农民却无力和/或不愿承担相应责任；自成一体的官僚系统，在思维和情感上与城市居民有更多共同点，却不能不时常响应占多数的民众（农民）的诉求，无论其合理与否，是不是超出帝国能力。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不是说农民低劣，而是说小农经济造成的思想和道德不可能适应工业化和城市社会。

^⑩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和西方的作家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官僚作口诛笔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败都堆在他们头上。虽说没有人能替他们辩护而撤除此类恶名，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第302页）他又说：“蒋曾受无数指摘。……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错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径地讲出应采取的路线。”（第369页）他当然也谈到了毛泽东，认为他成功地构建了底层结构，但“把因此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第378页）

^⑪ 当时英国请求蒋介石在缅北保留军队。不知道蒋介石是为了报复英国，还是准备内战，并未答应。事实上，内战失败后，李弥就奉命率残兵败将进入缅甸，此时缅甸已独立，其政府军剿灭李弥部队不成，便拿华侨出气，另向联合国控诉；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台湾撤军；而新中国也施加了压力。李弥部队在缅甸的友军便是此后不断遭到缅甸政府军剿杀的克伦族（吉仁）武装。在网上可以找到“李弥部队在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一文（覃怡辉，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⑫ 没法查到确切的资料，据说印度在战败后向藏南移民60万，作用之一就是中国不可能以当地人自决（公投）的形式收回那片土地。西藏叛乱发生在1959年。中印开战发生在1962年。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抗美援朝战争）是很难在当时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的。这些“如果”只不过是理论假设。

国不能容忍日本搞亚洲的门罗主义；如果它当年不能容忍日本，那么它今天也不会容忍中国。这是决策者和咒骂自己的国家却无力移民的中国人必须牢记的要点，在西方早就完成全球布局的情况下，恐怕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富裕的时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⑬

纵观缅甸战役，一再出现的话题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哪怕陶涵在《蒋总司令》一书中说宋美龄初见史迪威时就认识到“他是罗斯福在中国的人”。^⑭ 那全是蒋介石的错吗？史迪威到任之时，杜立德空袭东京，利用中国作为飞机降落的地点，中国人救援美军飞行员现在往往被作为中美友谊的事迹宣扬，但史实是日本报复的是中国，甚至屠杀了整个村子的人，蒋介石事先不知情，作为中国领导人的他当然会感到愤怒。^⑮ 作为来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将军，史迪威充满敢作敢为（can-do）的精神，但他在第一次战役期间确实低估了日军实力。但蒋介石肯定有他自己的责任：他以中国人的思维一再试图走上层路线或者说玩宫廷权术，仿佛赶走史迪威会有更好的结果。^⑯

^⑬ 为什么英国在1840年战胜中国之后并没有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是一个很有趣的学术论题。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清朝毕竟保留着统一政权的形态，与一个无能的统治集团打交道总比自己重新设立政权直接统治更容易获利，另一方面则因为大英帝国早已是“日不落帝国”，印度（当时包括如今的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对它已经远远超过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对日本的意义（印度独立被丘吉尔和本书作者视为大英帝国瓦解的标志，哪怕埃及在历史上与西方的关系更深，而英国在印度主要靠当地人治理），所以它只要了香港部分土地。后者更重要：在特定生产方式下，一个帝国的统治疆域是有限的，这种理论假说或许也能解释封建中国可以容忍朝鲜和越南独立，美国没有占据墨西哥的全部土地。

^⑭ 第201页。原文是：He was Roosevelt's man in China, and everything hinged on the ti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根据本书作者的看法，陶涵是蒋介石的辩护士，时常曲解史实。史迪威是经中国同意才上任的。详细情况可参看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

^⑮ 据陶涵的《蒋总司令》，为抵御日军的报复行动，蒋介石投入34个师，死伤3万人，而且陈纳德在华东的机场悉数被毁（第209页）。

^⑯ 史迪威还有个“敌人”是蒙巴顿。本书作者指出：“蒙巴顿犯的根本错误是假设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政策只不过是史迪威想法的翻版，没有意识到罗斯福的所有政策早于委派史迪威到中国。”（第十一章）此话完全适用于蒋介石。塔奇曼在谈到罗斯福终于下（转下页注）

蒋介石不应该不知道英国人从中作梗,美国人的主战场在太平洋上,他和毛泽东都正确地采取了拖字诀(持久战),因为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打不过日本人,而日本人肯定打不过美国人。^⑭或许出于民族屈辱感,他至少在表面上特别在意主权,哪怕他后来不得不吞下斯大林让外蒙独立的苦果。他的作为犹如当今中国大陆的某些“钉子户”,^⑮谈判资本有限,不是说试图达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交易,或者同时拒绝权益和义务,而是片面强调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价值。^⑯在他以出兵为条件争夺美援(“租借法案”物资)时,1942年6月4日美国在中途岛大败日本海军(尽管1942年2月15日英国在新加坡驻

(接上页注)令召回史迪威时则说:“这封电报在各种电报中语气最为冷淡;电报提醒蒋介石,发动缅甸战役的决定并非由史迪威做出,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并经过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同意的,当时是出于为中国提供物资的需要。”(第510页,译文取自万里新先生)。得知史迪威被赶走,据说某个中国高官说以后只怕没那么多美援了,事实果真如此。

^⑭ 日本战争机器的核心是在太平洋战区被美国敲碎的——日本海军和空军完全因美国而毁;美国人还消灭了日本陆军的精锐,据说占其海外战死人数的60%,其中包括制造南京大屠杀血案的16师团。日本陆军的骄狂是在诺门罕(诺门坎)被苏联(朱可夫)击破的——关东军最终也是向苏联军队投降的;战死8万多人,近60万人投降,哪怕其主力部队被部分抽调到太平洋诸岛屿(尤其是菲律宾)、中国(主要用于豫湘桂会战,就此战而言,日军取胜,只不过在此期间英印部队在科希马-英帕尔消灭了日本在缅甸的主力部队,在史迪威的麾下中国驻印军、美国的“劫掠者”部队、英国的钦迪特部队攻占了密支那[日本陆军三次“玉碎”战的第一次;更重要的是,美援在此战后不再完全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送入中国]、美军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因此中国的机场不再那么重要])。尤其是比较美日作战、英印部队在印度和缅甸发动反攻时、中国军队在日军3次“玉碎”战中的双方死伤情况的话,那真的很难让任何中国人顿生自豪感。

^⑮ 作为普通公民,我反对违法动迁,不给予公平市值的动迁,但我同样反对有意奢谈公平正义的嘴皮道德家,他们一概反对动迁,仿佛城市和基础设施能够不靠动迁建成,仿佛蒋介石不希望靠卖地财政避免财政危机或者青海省不希望卖出如同上海市那样的地价,更重要的是,仿佛贫民能够在不被动迁的情况下安居乐业,无论如何不愿意被动迁的那些人同意不享用依靠动迁建成的地铁、高速公路、高铁和机场。我认为极端事件越来越多,不仅与某些地方官员无知无能无耻有关,而且与当事人被忽悠有关。尽管这是题外话。

^⑯ 塔奇曼写道:“他仿佛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广东总督叶名琛一样,在英国海军的轰炸下既不谈判也不投降,因此广州人在当地的一首歌谣中唱道:‘他不打,他不和,他不守。他不死,他不降,他不逃。’”(第390页,译文取自万里新先生)。

军投降,3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报到,3月7日仰光沦陷);“1943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的关键事件并不是开罗会议的召开,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功地在吉尔伯特群岛登陆,证明了‘跳岛战略’的成功,加快了这种日子的到来:日本会处于致命的B-29轰炸机飞行范围之内。”(本书第十章)。

史迪威到底为什么坚持在中国战区直至被蒋介石赶走?在1942年时有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也许是因这个庞大的国家命运多舛、尤其是老百姓的凄惨生活而心生同情,也许是因为普通中国人的善良平和,也许是因为在中国能找到高高在上的感觉。这些因素肯定无法支撑史迪威坚持那么久。或许他希望带领中国士兵,成为真正的中国戈登,成为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那样独霸一方的美国将领。^②无论如何,放手让他培训和指挥哪怕30个师,不卷入美国内部斗争(尤其是陈纳德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事后看来,那是蒋介石最明智的选择。所以,第二个教训恐怕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处理本国内部存在的不同世界以及如何与发达国家打交道。恐怕体制内外很少有中国人认识到:

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努力摆脱其统治的弊端,但是每一次改革或者革命的努力总是蜕变为压迫和腐败,就仿佛在魔力的影响下王子又被变回一只蟾蜍一样。中国的乱政与其说是由于专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无效的统治。如果说权力会造成腐败,那么权力

^② 在修改期间发现黄仁宇先生有相似猜测:“史迪威将军和身边军官的心态,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结’。”(《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第28页)他认为史迪威要在其同胞当中证明自己的价值,认识到美援并非是美国的慈善,而史迪威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经验不可能推而广之。他甚至遇到一位智慧过人的美女(安)建议他退役:“她解释,国民党并没有宪政基础,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大学生却可以借游行、绝食抗议、散发传单等方法来捣乱,所以必须安抚他们。……会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会吵的孩子有糖吃。”(第55页)

式微就会造成更多的腐败，因为这需要不断达成交易、不断贿赂以及不断有各种通融安排。^①

所以，第三条教训便是我们怎么打扫干净自己的房屋，真正在融入所谓国际社会的同时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蒋介石应邀参加开罗会议，那是1840年以来中国政权的重大外交胜利，哪怕靠的是罗斯福的“恩赐”。但蒋介石及其将领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并未“为国争光”，就像他为下令给部队分发西瓜而与史迪威发生矛盾那样，根本不知道遵循和运用在西方已经成型的规则和礼仪。^② 这次会议导致罗斯福求助斯大林对日宣战，在雅尔塔会议上默许斯大林视中国北方为其势力范围。^③ 日本入侵中国是在其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而许多中国人“逢权必反”的心态很像是当年日军的“下犯上”，差别会不会在于中国人适合隔段时间自相残杀呢？目前表面上的群情汹涌恐怕是1840年以来的历史没有成为民族记忆的恶果：中国从来没有救世主，今后也不会有；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

印度在战后如愿以偿获得独立，其精英以大英帝国在南亚的继承者自居，最大的敌人居然是巴基斯坦。据《上海译报》2012年3月22—28日第18版（作者是秦喜），1951年，在1942年到1944年间的游击战中杀死120名日本兵的凯辛抗命率阿萨姆步枪队的200名官兵占领藏南地区。尽管如此，尼赫鲁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放弃印度继承自英国的在西藏的特权，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

^①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第469页;万里新的译文)。

^② 可悲的是哪怕接受过美国良好教育的宋美龄也不例外,本书谈到她在开罗会议期间的表现,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谈到她访美期间的表现(尽管她在美国国会演讲的良好反响至今没有其他中国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③ 参见如《大外交》第377—396页,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版。

定》。^④ 1962年双方发生短暂战争。1998年印度进行了核试验(实际上印度早在1974年就进行了核试验)。^⑤ 2012年5月19日,印度的“烈火-5”远程弹道导弹首次试射成功,射程5000公里(可以打到北京和上海)。诡异之处在于:假如中国四分五裂,那么国际宠儿印度一定会是下一个被欧美日遏制的对象。

在本文修改之时,5月13日中国、日本和韩国宣布就2002年提出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年内启动谈判,1940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正式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现代经济版本可能因此成型。真能形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进而形成亚元区,那么这3个国家的历史恩怨和领土纠纷才能稳定在口角之争上,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可能得到和平解决,不是东亚讨好东盟而是东南亚和南亚试图并入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之外的第三极。那其实也符合欧美的利益:当世界警察的代价太大,适当分权对它们和整个世界都更好。

那场战争还有个主角,即缅甸,在战争期间失望地发现日本并不是什么解放者,昂山将军及时投靠胜利者(英国),战后终于获得独立。跟随西方歌颂昂山素季的中国人不会理解她首先是一位民族斗士。缅族一统天下依然是个梦想。新中国间接承认了旧政权(清朝)与英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从1964年到1967年缅甸政府的排华行为导致中国支持克钦族武装在缅北斗争10多年,而在2009年缅甸政府军在果敢地区动武,2012年甚至有其士兵越境到中国杀人,现政权试图靠拢欧美来抗衡中国。当年先后协助英国和美国的缅甸少数民族最可怜,以克钦族为代表,他们还在试图抗击缅族的统治,至少争取更大的民族自决权,但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叙利亚反对派的他们甚至没引起所

^④ 有网友说在1954—1962年间,中央驻藏军政人员的供给大半由印度进入西藏,我没查到权威资料。该协定因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而知名。

^⑤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7/13/dont_even_think_about_it

谓国际社会的关注。

至于那些曾经活跃在中缅印战区的人物？史迪威没能活到蒋介石被赶出大陆的那一刻，1991年史迪威纪念馆对公众开放，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四川外语学院等机构在1993年创办了重庆史迪威外语学校，2006年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美期间特意会见小史迪威，那是史迪威将军去世60年以来，中国军方高级将领第一次代表国家向小史迪威表示对他祖父的谢意。蒙巴顿的伯爵爵位因缅甸而得名，他作为印度总督为大英帝国主持退出亚洲的葬礼，因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而背上骂名（尽管印巴分治时的血腥不能全怪英国人），1979年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死，但据说幕后黑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斯利姆是所有人物中结果最好的一个：这个小商贩的儿子跻身贵族之列，成为陆军元帅，曾任澳大利亚总督，还接替蒙哥马利就任帝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在二战期间的职位），他可是唯一出身于（英国）印度陆军而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中国的将领差不多都在内战中成为罪人，唯一跑到台湾的孙立人因被怀疑与第三势力（即借助美国势力取代蒋介石的密谋）有关，下场凄惨（1954年被免去陆军总司令之职，旋即被捕，1988年才被解除“监护”，1990年去世；第三十六号战犯杜聿明倒是早在1959年就被特赦了）。至于日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仅仅是日本政府和民间在纪念战死于云南和缅甸的官兵上做得最好，而中国才刚起步。^②

二

作者弗兰克·麦克林恩生于1941年8月，全名是 Francis James

^② 例如，“在龙年新春来临之际，为使健在的远征军老兵过上一个喜庆祥和的节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向保山市、德宏州两地220名远征军老兵发放慰问金共计22.7万元。保山市委统战部、德宏州委统战部分别代表保山市、德宏州老兵领取了慰问金。”<http://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2/01/06/012464880.shtml>

McLynn, 根据本书原版的介绍, 他还写过 24 本书(书名如下), 但根据维基英语版则是 26 本:

France and the Jacobite Rising of 1745

The Jacobite Army in England

The Jacobites

Invasion: From the Armada to Hitler

Charles Edward Stuart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Stanley: The Making of an African Explorer

Snow Upon the Desert: The Life of Sir Richard Burton

From the Sierras to the Pampas: Richard Burton's Travels in the Americas, 1860 - 69

Stanley: Sorcerer's Apprentice

Hearts of Darkness: The European Exploration of Africa

Fitzroy Maclean

Robert Louis Stevenson

C. G. Jung

Napoleon

1066: The Year of the Three Battles

Villa and Zapata

Wagons West: The Epic Story of America's Overland Trails

1759: the Year Britain Became Master of the World

Lionheart and Lackland: King Richard, King John and the Wars of Conquest

Heroes & Villains

Marcus Aurelius: Warrior, Philosopher, Emperor

他与塔奇曼一样, 因演绎历史而知名, 或许可以认为他是英国的易